

20世纪中国民族学
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陶云逵 ⊙ 著

ESSAYS OF
TAOYUNKUI

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

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

陶云逵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陶云逵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 12

(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ISBN 978-7-105-11987-5

I. ①陶… II. ①陶… III. ①民族学—文集
IV. ①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071号

策划编辑:王铁志 黄显辟 虞农

责任编辑:张华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585千字

印张:22.375

定价:65.00元

ISBN 978-7-105-11987-5/C·328 (汉28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文 精

副主编：王建民 毛公宁 王铁志

编 委：文 精 毛公宁 王铁志 王建民
祁庆富 张海洋 黄显辟 宋 全
关 凯 滕 星



导 读

——寻找逝去的情怀

李东晔

陶云逵，原名陶祖逵，字似龙，1904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出生，祖籍江苏武进。其父陶瑑（原名陶璐），字宝如，又字剑泉，号佚庄，擅长书画，宣统元年（1909年）曾出任河南临颍县知县（保举知府衔，从四品），后来与金城等人一起创建了北方“中国画学研究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陶湘的孪生兄弟。陶瑑原配夫人庄氏于1900年病逝，云逵先生是其续弦张氏所生之独子。

云逵先生1924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继而升入南开大学，其间由于受到1923—1925年在南开大学任教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等学者的启蒙，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兴趣。但1925、1926年父母的相继离世对他造成的打击很大。1927年，云逵先生选择离开南开远赴德国求学，先后就读于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并于1933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据先生的女儿陶宗舜女士回忆，她父亲生前与他的五姨感情最深，当年留学亦是靠五姨丈的资助，为了资助他出国求学，五姨丈变卖了位于北京王府井的房产。



回国之后，陶云逵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员一职。^①上任不久，即受中央研究院的派遣，前往云南做了为期近两年的体质人类学调查。抗战爆发后，先后辗转长沙、香港、缅甸、越南等地，于1940年起再度到云南，历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代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讲师、教授，并于1942年南开大学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时，出任主任一职，直至1944年1月26日在昆明病逝。1904—1944年，短短40年的生命，陶先生行路多多，著述多多，苦难亦多多。

回顾云逵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主要有两个活动区域，一为欧洲，一为云南。在云南期间，1934—1936年主要在滇西北至滇西南调查，而1942—1944年，他的研究区域则转移至滇东南，自昆明经玉溪至红河一线。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早期的体质人类学，到后来的文化地理分布、社会历史以及边政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总体上我们将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类学学术生涯的开始。1927—1933年，云逵先生在德国跟随体质人类学教授欧根·费舍尔（Eugen Fischer），着重于生物遗传学的研究，通过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进行的调查，写成论文《华欧混合血种——一个人类遗传学的研究》。该论文有德、汉两个版本，本书所收录的是刊载在1937年《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中的汉文版。

这篇关于华人与欧洲人所生子女的人类遗传学研究，基于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的遗传定律，就如他在文中所言：“本文的内容就是要证明曼德尔（孟德尔）遗传

^① 徐益棠、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序，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印：《边疆研究论丛》，民国卅四年至卅七年，第三期。



律之可以用在华欧血种混合的遗传现象上。”^① 此研究自 1931 年至 1933 年，共在欧洲几个国家分别选取华德、华法及华英等混血样本 140 人，分别就皮色、发色、发型、体高等十多项指标进行测量与观察。

在他的这项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他注意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但研究人的遗传，人类学家却不能像动植物家去任意选种，使其交配。换言之即是不能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因此必须在自然中去取现成的材料。研究人种遗传最好的材料便是杂种（hybrids），即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结配后所生的子女。其次为有病态性质之家族。”^② 同时，他还指出：“真正的纯种在现代人类中是找不到的，那只是个理论上的名词。”^③ 此外，尽管体质人类学非常强调测量的重要性，但他还同时兼顾到了实际的社会观察的必要性，“因为材料多半是在童年的杂种，所以除了测验而外，特别注意描写。”^④ 该论文写作非常严谨规范，不仅有详细的研究综述，而且对整个研究的过程、样本的选取、研究方法、测量仪器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都有具体的交代，各项测量结果都一一列表加以统计分析，同时还附上了大量相关的照片。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提出相关的人类学观点，只是试图在方法上强调一种科学性，当然，这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潮不可分割的。

据说，陶先生当初出国留学之时曾立志“要入第一流大学，从第一流大师”^⑤。我猜想，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影

① 陶云逵：《华欧混合血种——一个人类遗传学的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37（2），69 页。

② 同①，70 页。

③ 同①，71 页。

④ 同①，78 页。

⑤ 冯文潜：《敬悼陶云逵先生》，见《云南日报》，1944 年 2 月 16 日。



响国人的那种“科学救国”思想，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爱国青年人一样，年轻的陶先生对“科学”也一定有种强烈的渴求，或许也正是因此才追随了费舍尔学习人类遗传学。费舍尔是德国著名的集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于一身的学者，但由于他的研究立场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并且随着二战爆发，他加入纳粹并且成为希特勒的重要“智囊”，为其种族屠杀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以至于日后被学界所“憎恶”，被称做“纳粹学者”。^① 陶先生对此持何种观点和态度？现已不得而知。应当说，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在整体上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作为一个有志之士怎能不期待一种改造的武器？费先生在回忆与陶先生见面的情景时就提到：“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的人中的先进。”^② 瞿同祖先生曾经回忆：“去年（1943年）夏天，我请他为云大担任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他坚持不肯，说他对于体质人类学已感到厌倦，不愿再弹老调，我再三劝他，他终于不肯，最后还是只得由他担任西南边疆社会一课。”^③ 遗憾的是，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探出其中的究竟，只能天马行空地揣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陶先生不是一个“血统论”者，他曾经说：“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④ 他是一个试图与命运抗争的人，尽管他早先所追求的是那种建立在文化与自然科学双重基础上的人类的遗传学、优生学，这从他博士期间所从事的遗传学研究便可获悉，但与此同时，严峻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却让当时包括陶云逵在内的大批留学

① Schmuhl, Hans - Walter.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1927 - 1945: crossing boundaries,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② 费孝通：《物伤其类——哀云逵》，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28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③ 瞿同祖：《悼云逵》，见《正义报》，1944（4）。

④ 同②。



归国知识分子陷入一种理想主义的困境，他后来为《战国策》所撰写的《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他写道：“人类最高的孛生理想是真与美。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也唯有力人才是真。美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唯有力人才是美，唯有力人才能达到这理想，唯有力人的世界才是真美的世界。”据其女儿回忆：“听说父亲当年常常感叹，现在的人太坏了，如果可以用机器造人就好了，只造好人。”他后来还因此使用过“力生”这个笔名。但不幸的是，他们的那种理想主义不仅在当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日后还被冠以“法西斯主义”等名头，当年很多参与过《战国策》撰稿的人员也都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第二阶段，云逵先生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就职不久，即赴云南参与滇缅边界未界定民族考察，自1934年秋至1936年春，他北及毒龙河（独龙江），南至九龙江（车里，今西双版纳一带），进行了广泛的人种调查。^①1934年10月，他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去云南作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凌纯声、勇士衡为一路，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任务是考察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陶云逵、赵至诚为另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越、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任务为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调查注意采用先进仪器设备，利用当时已有的先进手段进行田野调查，以更为全面地搜集资料。两组调查者都携带一些进口设备，凌纯声等携带有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测高仪等；陶云逵等则准备了人体、面部、头

^① 陶云逵：《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本，1936—1938，121页。



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照相机，录音机等。^① 这是他在云南的第一次田野工作，此次调查历时近两年，不仅成就了云逵先生西南研究的基石，同时也促使其学术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转移——从体质到文化。尽管这次调查的初衷是研究“人种”，但由于此次工作的性质，他却关注到了大量“人种”以外的文化事项。

与此期间调查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本文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章主要源自这次田野调查（不一定是这期间写作发表）。其中包括最早刊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中的《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和《碧罗雪山之栗栗族》，后来陆续发表的《麽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车里摆夷情书汉译》、《一个摆夷神话》、《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以及《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此外还有原载于《西南边疆》第12、14、15期中他的部分日记《俅江纪程》以及用笔名力生发表在《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期上的随笔《云南怒山上的栗栗人》等十余篇文章。

首先，通过《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我们可以对他这次田野工作的路线、区域与调查对象有一个总括性的了解。从滇西北至滇西南，他对当时云南的民家（白族）、摆夷（傣族）、栗栗（傈僳族）、麽些（纳西族）、曲子（独龙族）、怒子（怒族）、窝尼（哈尼族）、傈黑（拉祜族）及阿卡（佤族）9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与人口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在文章一开始他就对“人种”这一生物学的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该书也为勾陈陶先生的史迹提供了不少参照线索。



名词与“民族”这个社会学的名词^①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此外，文章中还注重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引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其学术研究的历史地理传播取向以及严谨的态度。

基于这一时期田野工作所正式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麼些、栗粟与摆夷三个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调查和分析。其中《碧罗雪山之栗粟族》是一部典型的民族志，从生活在碧罗雪山上的栗粟族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姻家庭、生命礼仪、社会结构、战争、语言及信仰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记录。而对于麼些，则着重对其占卜进行了调查记录——《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因为该文发表在后来的《边疆人文》上，我们将在后面再做介绍。

有关车里摆夷的著述本文集收录有五篇，其中的长篇《车里摆夷之生命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是他的遗作。虽然成文很早，但由于各种原因几经拖延，正如徐益棠在序中告诉我们的：“时余编边疆研究论丛，乞云逵赐稿，云逵乃以此稿寄余。匆匆校读一过，拟刊入论丛第二辑（卅一年至卅二年），以篇幅过长，留待次辑，不意云逵于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回归热逝于昆明而不及见也。年仅四十。”他继而写道：“云逵治学勤慎，颇有德国学者的风度。兹举一例：此稿寄余后数日，即来函嘱改正若干小疵，如序中‘六年’改为‘七年’，政治制度章‘内官’节中之英文译音之删除是也。三十二年（1943年）冬，又函嘱将旧稿寄去，拟增入一年来所得之新材料。”^②

该篇长文记叙了摆夷从出生到死亡，整个一生中的诸多方

① 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1936—1938，419页。

② 徐益棠、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序，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印：《边疆研究论丛》，民国卅四年至卅七年，第三期，2页。



面，也是一部相对全面的民族志。就如陶云逵在自序中所述：“本文主要是叙述摆夷自生至死，一生中生活的各方面，即所谓‘生命环’。以生命环为经，以生活的各方面为纬。因为摆夷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两者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差异。故所以在叙述本题之先，把他们的社会体系，如阶级、政制等，加以阐明。在材料整理之后，感到有很多的遗漏，例如生活的经济方面，全付阙如。又本文没有个案调查，仅报道了一个 Ideal Type (Max Weber)，也是方法上的一个大欠缺。因为这种原因和参考书的缺乏，本文仅将所看到的听到的（而认为可靠的）实事，叙述出来，既不作社会学的诠释，也不作历史学的考证。所以把本文付印，仅为保存一个摆夷生活的忠实记录。”^①

其余四篇有关车里摆夷的文章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功底。他不仅重视查阅、引用历史文献，还特意搜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本与口述文献，“笔者于民国二十五年调查滇边，集得车里、孟连、猛哲、猛茫、耿马等五土司之原文史志各一册。”^②前者以《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和《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为代表，而《车里摆夷情书汉译》与《一个摆夷神话》以及同样为遗作的《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则是他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献的最好说明。他非常重视神话故事的搜集，指出：“他们的神话是活在他们生活之中，从神话，我们不难窥见其人群之信仰，道德和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从比较民族学观点来研究文化的播传、演变，以及诸民族的亲疏关系问题，神话自亦为重要的

① 徐益棠、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序，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印：《边疆研究论丛》，民国卅四年至卅七年，第三期，2~3页。

② 陶云逵：《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一册，1944，41页。



研究对象。”^① 但不无遗憾的是，就如他自己在文中也提到的，由于缺乏比较材料，所以这些文献仅限于记录整理，“聊当一种研究资料。”^②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陶云逵作为一个学者的赤子之心——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这种奉献，我们通过其发表的部分日记《俅江纪程》也可窥见一斑，他写道：“自三四至三六两年间，我走了不少的路。单先把这段日记发表，是因为：自叶枝往西，走北路渡澜沧江越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至毒龙河，然后走南路向东渡越同名的山江之南段而达小维西这条路线，及其所包括的区域，很少有人到过。而到过俅子地（就是毒龙河流域）的，尤其少。……我把这段日记写出来，也许有点实际的用处，就是给预备到那区域的人，一个途纹上的参考。”^③ 他是那种勇于且甘于做先驱者、铺路石的人。就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在这连载的日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沿途的社会人文及地理状况，还能领会包括田野关系等诸多学术信息。

在对这几个民族文化的论述中，他都首先对各族族称与分布状况加以叙述，使读者对该族群人口及其文化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这一方面与其承接的德国学派之传统是有所关联的，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国的学术向来注重历史文献研究的传统，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云南进行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的陶云逵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鲜活的例证。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云逵几度辗转，再次到达云南，先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并于 1942

① 陶云逵：《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载《边疆研究论丛》，第二期，1 页。

② 同①。

③ 陶云逵：《俅江纪程》，载《西南边疆》，1941（12），55 页。



年6月南开大学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后担任该室主任。从呈贡的魁阁，到创办学术刊物《边疆人文》，这个阶段虽然应当说是陶云逵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但也是他最为磨难、最为艰辛的时期，同时还是他学术上的成熟期。此间，他与心爱的人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但当时的中国哪里能容得人们有一丝的安宁，大部分人都随时面临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但即便如此，陶先生还是怀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云南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研究中，直至英年离世，令生者与后人为之不禁潸然泪下。

为了《边疆人文》的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这个刊物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西南地区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著名学者。陶云逵还亲自带领该室研究人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及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开展调查工作，取得了大量社会调查珍贵资料。^①

应当说“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前后是云逵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分水岭，此间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文化”的讨论上。无论是关于“边政”的几篇文章：《开化边民问题》、《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关于“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倭寇侵越与我边民之责任》以及遗作《边疆与边疆社会》等，还是研究室成立之后的几个专门讨论“文化”的短篇《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属性》和《个人在文化中的参预》，其核心都是“文化”。其中，他在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中指出，边政目的的重心是文化的“统一化”——“但所谓文化的统一化并不是说主观的以固有的中原文化标准而把其他的同化，也不是说取某一个边社文化为标准而把中原文化与其它边社文化同化起来。所谓边社文化的改变，也并不是改变成固有的中原文化。这里所谓文化的统一化或文化的改变乃是把边社的文化也跟中原人群的文化一样的‘近代化’起来。换言之，就是全国近代化的统一化！这里包括教育的近代化，经济的近代化，政治的近代化，军事的近代化，交通的近代化等等。”^① 在该文中，他强调边政人员训练的重点也应该是加强对“边社文化”的了解，同时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文化及其性质”等问题。他认为“文化”可以从“静的或形态的”与“动的或动能的”两个方面来看。其中前者又分成物质的、社会的及精神的三部分，但三者仅是人为的分类，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作用；而后者则是实为一套“理念体系”（A system of ideas）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②

《开化边民问题》则对“文化”进行了更加全面地讨论，并且指出了当时边疆政策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他首先提出“文化”的两种差别：“一是形态差别，一是（外向）功能差别。”^③ 并且认为：“总之：文化是有差别的，在形态上或者外向功能上。从比较形态上讲，无价值问题在内，从功能上讲，文化有高下之别。每一文化自其本文化之功能而言，则其文化即其社会的价值总合。但一切差异，无论形态或功能均是相对的。”^④ 他注意到：“我们的边疆政策，弊病在于单边的，仅顾政府一方面意旨而未

① 陶云逵：《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载《边政公论》，第二卷，第三四册，1943，3页。

② 同①。

③ 陶云逵：《开化边民问题》，载《西南边疆》，1940（10），4页。

④ 同③，6页。



从边民意旨与生活实况着想。”^① 有意思的是，陶云逵在文章中一再提及似乎并不被他“看好”的功能派，他写到：“研究简单文化，一向认为是人类学的范围，但人类学在以往大半功夫用在考证。注意过去，忽略现代，避谈将来。研究重点在死的形态比较，而不探索其活的功能关系。我们不愿与功能派共一主张。认为文化问题就是功能问题。但谈到实际应用，谈到预言（pre - dict），这个科学的主要条件是舍功能方法以外。别无他策。为实用不但得认识一群人文化中各方面各因子的外表形态，并须认清各方面各因子对其社会整合上的功能关系。”^② 所以，一个伟大的学者一定不可能是眼光狭窄的人，一定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包容力。费孝通先生对此有很深的感悟，对他们之间在学术上“相反相成”的情谊记忆犹新。他写到：“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响了交情，甚至互相中伤，形成了党同伐异的风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这传统的遗毒。但是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当他离开云大时曾和我极诚恳地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了起来。’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生活要丰富就得有一个可以时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得起内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创造。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这因为我们不会再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新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他是明白学问的人，为什么中国明白学问的人就不易长寿？

① 陶云逵：《开化边民问题》，载《西南边疆》，1940（10），11页。

② 同①。



这是我永远不明白的。”^① 云逵先生也曾特意举实例说明“功能”的重要性：“我们对于改变边民文化，应当探索其原有文化各方面功能，设如认为原有的习惯不好，我们不能突然把它禁止，我们须给他们找条出路，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换言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形态去表现同样的功能：这种方法我们可称之为‘替代法’。”^②

他还注意到了“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体现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与《个人在文化中的参预》两篇文章中。两篇文章都涉及文化的变迁，前者更多地谈及一种“受到外来影响的、被动的变迁”——边政问题。指出了在边地社区生活的汉人对于边政的重要作用——由于他们对于边地社会情况以及人民心理的了解，所以他们是推行边疆政策的非常好的“桥梁”。在后一篇文章中则主要讨论了“由于文化内部的因素而引起的变迁”，他将文化划分为四种范畴：普遍的、专门的、并存的、个人特有的。他提出了“个人特有的”之于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这种因素“乃是文化变迁的一个起点。将来这个人特有，如果推行，便溶入社会，而为文化的一部分了。”^③ 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文化的“心核”概念——“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文化，包含有两个层次或部分，第一个是一个结实，合整，而较恒久的心核，即是普遍与专门的两种；第二是一个流动较大，多半未合整的常在变迁中的并用的，这并用的常是围绕着

① 费孝通：《物伤其类——哀云逵》，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31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陶云逵：《开化边民问题》，载《西南边疆》，13页，1940（10）。

③ 陶云逵：《个人在文化中的参预》，载《自由论坛》，第二卷，1944（4），2页。